



传奇

情诗

古今藏汉英
最全文本

秘传

赞辞

中国藏学出版社

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诗意图二百年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

根据黄颢 吴碧云《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新编

传奇

情诗

古今藏汉英
最全文本

秘传

赞辞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80253 - 252 - 6

I. ①六... II. ①中... III. ①藏族 - 情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5212 号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意三百年

作 者 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 25
字 数 578 千
印 数 3000 册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252 - 6/I · 99
定 价 68.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zccb. com. cn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编前言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6）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才华横溢，风流文采，他创作的诗歌深为西藏民间所爱，并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几乎人人皆可吟咏背诵，穿越时空三百年而传唱不衰。但是直到20世纪初，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及其诗作在藏地之外还是少为人知。于道泉教授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将《仓央嘉措情诗》译为汉文、英文，使这些美丽诗篇不仅风靡全国，而且远行海外，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激赏和赞叹。之后，五言、七言、自由体，仓央嘉措情歌汉译本迭出，对其人其作的研究由此开启，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坛上一个特别的亮点。

上世纪80年代初，黄颢、吴碧云所辑《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一书将民国以来仓央嘉措情歌的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章合集，引起热烈反响。该书出版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是当时国内外第一部全面展现仓央嘉措生平、诗作及其研究、评论文章的集著。所辑录的诗歌译作及论文，均为汉文世界最早发现情歌、最早翻译情歌、最早评论研究仓央嘉措情歌和生平的作品，新鲜、生动，有思想、有见地，以后蜂拥而起的大量介绍、研究乃至译作等各类作品大多不脱是书窠臼。不论从版本种类的介绍和研究的深广度，可说无出其右者。三十年过去，这部汇编本仍在被持续地复印和传播，借助互联网，聚集了众多的追星一族。鉴于此，我社以此为底本重新编辑，在基本保留了原书样貌的基础上，新增了当代学界专家与新人的评述、译作，并对诗歌的藏、汉、英几种文本做了勘误，对民国时期译文中用典之处尽可能地做了注释。在形式方面也予以较大改观，使其更符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过去的版本是一道令人流连的风景，新的作品更熔铸了当代人的感悟和情思——超越了时空、地域、民族、语言，仓央嘉措和他的诗作不朽，为全人类所共享。

总之，尽心尽力为读者奉上有关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传奇、情诗、赞颂等林林总总、内涵丰富的这样一部合编，集百年诗文、诗情、诗意之大全，可谓一书在手，情诗流传三百年之风情尽现。以不同的语言文字传诵的诗句，共同地洋溢着诗人的情怀和诗意，伴随着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转世、废黜、诏解、道死、圆寂，直至众说纷纭的风雪夜遁、不知所终的传奇，在三百年历史风云中流动，展现着永远的魅力。

2010年11月

1920年代首译仓央嘉措情歌始末

——代序

于道泉

当我知道这本《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吴碧云两位同志着手编辑时，我感到很高兴。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汇编研究资料是其中重要方面之一。

《汇编》本的编者诚恳地要求我写一篇序言，并希望我回忆一下五十年前我是怎样开始翻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歌的。

盛情难却。我经过考虑，同意为之作序。我感到青年们在努力从事科研工作时，是需要老一辈人的鼓励和支持的，加之，让他们了解一些旧时代的情况，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理应尽到我的责任。

半个多世纪以前，更确切地说1922年前后，当时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就是经常在《小说月报》上写小说的“落花生”先生——到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暑期学校去讲学，那时候我正在齐鲁大学半工半读，许先生的讲稿就是由我负责往油印室送的，因此认识了他。有一天我问许先生说：“您所写的《空山零雨》我喜欢极了，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没有？”他说：“没有。但是有人写信给我说，他把它翻译成世界语了，写信给我的人我还没给他回信呢。”我说：“给您写信的人就是我。”

^① 《汇编》一书初编于1980年，于道泉先生为该书写了序言。此次新编时，仍以此篇代序。——编注

我于1920年到齐鲁大学读书，那时候我对用英语听课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便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世界语。因为世界语比英语容易学，我学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把许先生的一些散文诗和《空山零雨》译成世界语寄给上海胡愈之先生主办的一份世界语刊物《绿光》(Verda Lumo)。胡愈之先生居然把我那份译稿登了出来，并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对我鼓励的信。因为许先生和胡愈之都是当时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彼此都认识，从此以后许地山先生也对我非常热情，并且还介绍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我于1924年从济南到了北京，跟着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帝俄科学院的院士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A·von Stael-Holstein)学习梵文和藏文。那时许地山先生正在英国留学，过了两年他便回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担任教学工作，此后，我能与他经常见面。

当时，我对藏文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设法认识了雍和宫东侧北大门住的几位藏胞。他们借给了我一间房，要我搬到他们那里去住，《仓央嘉措》(Tshang dbyangs rgya mtsho)这本书是我在那里住的时候见到的几本使我感兴趣的藏文书之一。我到许先生那里去聊天的时候，同他谈到了这本书，他便动员我把书翻译出来，并说他可能替我找到发表的地方。这本书是藏族民间通俗读物的一种，里边佛教术语和文学典故不多，经过藏族朋友的讲解，内容大部分我可以理解，可是还有不少的地方我一直无法搞懂。虽然我把我能懂的翻译了出来交给了许地山先生，并且请他对译文做了一些润色修改，可是把这样一份我自己都对它没有信心的译稿拿去发表，总觉得不太合适，因此这份译稿被搁置了很长的时间。

借给我雍和宫北大门房子住的那几位藏族朋友，到北京来以前都是达赖喇嘛跟前的僧官。因为很多年以前清代的朝廷就有一种规定，要达赖派三位僧官经常住在北京。他们的职位，一位是Mkhan chung(小堪布)；一位是Mgrognyer(知客)；一位是lo tsa ba(翻译官)。我没到北京以前，达赖派住北京的僧官是在西藏寺院住过多年的蒙古族喇嘛。我于1924年到北京来的时候，从西藏派来的三位僧官刚到北京不久。当时的“小堪布”我同他不熟，因此他的名字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他的名字里有顿珠(don grub)二字。“知客”是降巴曲汪(byams pa chos dbang)，当时的“翻译官”是楚称丹增(Tshul khri ms bstan vdzin)。

在这期间，我已由袁同礼先生推荐，到当时的北海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

馆的前身)去担任满、蒙古、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因为当时我感觉自己的学识太浅,年岁也小,才二十几岁,愿意保留一点学习进修的时间,因此宁愿少拿一点工资,每周只工作三天。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经济负担加重了,每周自学三天的计划无法继续下去,乃由清华历史系的陈寅恪教授介绍到当时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历史组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工作。也是每周工作三天。当时历史组的主任是傅斯年兼任,考古组的主任是人类学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语言组的主任便是赵元任先生。我向傅斯年申请要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出版这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汉译文之后,赵元任先生对藏语的发音产生了兴趣,他把楚称丹增的随从、我最熟悉的藏族好友罗藏桑结(Blo bzang sangs rgyas)请到他家对藏语进行了多次记音。赵先生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记音说明》,是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和理论阐述藏语语音的第一篇文章。早已为国际语言学界所普遍采用的“四段五点字母式声调符号”,就是赵先生在为这本书中的歌词标音的时候所设计创造的。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些往事。在这里我要讲一点和这事有关的情况。当时在这本书付印的时候,我只在我所写的汉文和英文的“译者序”里边说这本书中关于藏语语音的部分都是赵先生写的,可是,赵先生把他写的《记音说明》的汉文稿和英文稿交给我的时候,没有在文章标题下面署名。我把那份稿件送去排印的时候也忘记了把赵先生的名字添上。以致后来不少的人在引用这本书的语音部分的时候,就把我当做曾经在国际语言学界发生过不小影响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每当在外文书中看到如此引述就使我局促不安。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访华,和我谈起五十年前出版的这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时,特别提到“我”的《记音说明》一文“写得很好”。这都是由于我当时的疏忽大意,在读者中造成思想混乱。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应该向赵元任先生道歉,向这本书的读者道歉。

在这期间,我曾替北京图书馆买到一些蒙藏文书,其中最大的一批蒙藏文书,就是由地处原沙滩北京大学一院后身、嵩祝寺天清番经局所印的那批书。在这批书里边有一部《隆多喇嘛全集》(Klong rdol bla ma ngag dbang blo bzang gi gsung vbum),此书中有一卷是《噶当巴及格鲁巴喇嘛著作集约略若干种目录》(Bkav gdams pa dang dge lugs pa bla ma rags rim gyi gsung vbum mtshan tho)。这时,藏族地区以外研究藏文的人对藏文图书目录还知道得很有限,陈寅恪教

授给我安排的研究任务就是整理这本藏文书目。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藏汉词典，我学藏语的时候所用的几本辞书都是英文的，这些辞书里边佛教的名词术语非常少，里边所有的佛教术语也没有汉文译文，所以对我也毫无用处。但是在上述那部书目里边，佛教的术语却占很大的比例。我曾多次向傅斯年先生申请，要他准许我做编写汉藏词典的工作。可是我每次为这件事去见他，他一听到我提词典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对我说这事没有商谈的余地，我只好“知难而退”。但当我回到办公的地方以后，对上边交给我的研究任务怎样进行却一筹莫展。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白天我在坐办公室的时候，感到无所事事，盼望早点下班；下班回家后为了整理一份有一万多张卡片的“藏—梵—汉佛教名词术语词典”的资料却工作到深夜。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当然做不出成绩。过了一年多，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领导就开始对我表示不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把我未到研究所以前所写的这份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做我在研究所的工作成绩。随之，由赵元任注音，由我注释并加汉英译文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于1930年，在北平出版问世了。

现在回想起来，若是我在山东齐鲁大学暑期学校没有结识许地山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人动员我翻译这部《情歌》。再者，若是我编写藏汉佛学词典的申请很顺利地得到批准，那么很可能从此以后我便把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这一工作，而把这份我认为不成熟的《情歌》译稿搁置起来。

当时傅斯年再三催促我到国外去进修，而我对出国留学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乃是编写藏文词典，因为它对研究藏族的语言、历史是迫切需要的。我认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自己面前摆着许多自己非常想看的书而又无法看懂；使我最感幸福的就是，使自己得到一种便利条件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可以把自己这种痛苦解除，同时也解决别人这一类的许多痛苦。傅斯年当时所以不同意让我编写词典，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主要是陈寅恪教授的意见，陈教授对这件事的想法我也有所理解。他认为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书要有一点学术水平，要编写一部有学术水平的藏—汉佛教词典，应该由一位不但对佛学有所造诣，而且对印度的梵文也要精通的人担任。我当时对梵文刚学会字母，对佛教更是一知半解，那么，当然不能让我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工作。

这都是四五十年以前的往事，在这四五十年的期间，全世界和全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多部藏汉词典，但是对研究藏文的

人来说，上述那种有书看不懂的痛苦仍然没有减少。有一件事是五十年前所没有的，就是对各种词典的编写工作，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前人所无法想象的新工具——电子计算机，用这样的新式工具可以比旧办法提高效率几十倍。但是需要一批年富力强、对此事具有热心的人，肯下一番功夫，掌握这种新技术、新工具，那么再过七八年国内藏学界的情况可能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化。

上述是我对翻译《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过程的几点补充回忆。同时也对怎样以更先进的方法从事今后的藏学研究，谈了自己的设想。

时间飞逝而过，藏学的发展是很快的，在《情歌》的翻译研究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感到《情歌》是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这种力量曾促使不少人去从事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本《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中看到这点，而且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这正是我国广大藏学研究者勤奋研究的结果。事物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而发展又总是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去的影响，因此，为了有利于今后对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趁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之际出版此书，我想，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希望它能为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同志起到某种借鉴作用。

我特别高兴的是，久已盼望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即将成立，这对西藏的理论建设无疑是一件好事。我在此致以最衷心的祝贺！并坚信在党的领导下，藏学研究工作者和全国各族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团结一致，定会取得更加可喜的成就！

1982年

附：于道泉简介

于道泉(1901—1992. 4. 21)字伯源,山东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是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先生的长子。从小受其父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凛然正气和笃学精神。季羨林曾评论其“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于道泉先生还是语言奇才,掌握了十三种语言,有藏、蒙古、满,以及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

于道泉1924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社会学系,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美资格,后放弃留美,计划随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去印度学习梵文和印度古宗教史,又因国内政治原因未能成行。后由泰戈尔推荐在北京大学担任钢和泰(俄国东方语文学博士)随堂英语翻译,同时跟钢学习梵文和藏文。1926年去北海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担任满、藏、蒙古文书籍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并负责善本部,收集满、蒙古、藏以及其他各兄弟民族文字和文献。今天国家图书馆特藏部民族文字古籍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当年于道泉先生和彭色丹喇嘛等人采集来的。于道泉多次发表有关三种语言的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受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职。在业余时间,曾经开始编纂汉、藏、梵三种文字对照的佛学辞典。《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翻译成书的。

1934年5月至1935年7月,于道泉在法国巴黎大学官费留学,学习法语、土耳其语,并师从巴考教授学习藏文,与石泰安相识结为挚友。且曾受杜奇邀请去意大利与罗马大学合作,因公费留学身份而未果。1935年8月至1937年在德国柏林学习德语,因未获中研院同意,遂自谋生活及经费来源,曾为印度友人担任德文翻译。1937年下半年回到巴黎,半工半读,在巴黎大学图书馆编写中文图书目录,兼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汉语。1939年至194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高级讲师。此10年间,虽身居海外,但十分关心国内局势,与在延安的妹夫陈云及妹于若木等常互通音问;北大校长胡适之亦曾于1946年来函聘请于先生回国担任藏、蒙古语文教授,因内战又起,未能成行。1949年,于道泉先生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满怀赤子之心,毅然回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系任藏、蒙古语文教授。期间胡乔木亲自点名邀其筹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1950年5月23日第

一次正式播音。同时受聘于北京图书馆担任特藏部主任。此后直至其逝世，一直兼顾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被称为国家图书馆“不拿工资的馆员”。1951年受聘国家民委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班，任教授及藏语教研组长。在教学中不忘科研，专门设立了字典小组编写拉萨口语字典，延聘安多、康、卫藏和嘉戎等各方言区藏族学者，组织从事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实际上为后来展开的全面藏语调查做了准备。安多、康、嘉戎和卫藏多种方言字典的出版问世，许多研究专著得以发表，于先生功不可没。

“文革”期间，于道泉先生自然是厄运难逃，先是游街、批斗，后是下放劳动。于先生“处变不惊，心若止水”（季羨林《牛棚杂记》），整天摆弄他的“数码代音字”以自娱，后来这种方法竟成了他的一大发明。1969年到湖北潜江县“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由外交部借调回京，受命解读伊朗大使转来的一卷在伊朗发现的古藏文文书，有机会了解国外同行学术进展情况，又借机抄录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卡片，供同好传阅，以解当时处于文化沙漠中的饥渴。以后又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一直在学院工作到83岁。1992年4月12日于道泉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学界共同哀挽这位语言巨星的陨落。

汇编初衷

黄颢^①

一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是关于西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的原文译文及论文辑录等。六世达赖全名是普慧洛桑仁青仓央嘉措，他所著的情歌也称《仓央嘉措情歌》。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是西藏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其情歌脍炙人口，名驰遐迩。

仓央嘉措于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藏历阴水猪年）生在门隅的宇松^②。《隆多喇嘛全集》说，此地属“门措纳”。父名扎西丹增，信仰红教；母名才旺拉姆。系一贫苦农民家庭。据有关调查，仓央嘉措一家先居该地的派嘎，后因亲戚迫害弃家出走，即居达旺的乌坚林。

仓央嘉措年幼即被当时任第司（或第巴）的桑结嘉措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系于仓央嘉措降生的前一年（1682年）去世，第

^① 黄颢（1933—2004），男，汉族，1933年生于北京。1955年，受其外公、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指点，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学习藏语文。1959年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在改名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历史室藏族史组工作，直到退休。他十分重视藏文原始典籍的发掘和运用，在翻译藏文史籍的同时，对西藏历史进行认真的研究、对比、考据，因此，标明大量注释是黄颢译著的学术特色，为学界同仁所看重。其专著与译著有《新红史》、《活佛转世》（合著）、《在北京的藏族文物》、《青海史》、《贤者喜宴》，以及《贤者喜宴》译注、《新红史》译注、《佛历表》译注，合作编纂史料集《仓央嘉措情歌及其研究》、《格萨尔研究论文集》、《藏文史料译文》《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等多部，发表论文《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略述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等总计80篇。黄颢毕生从事藏族历史研究，为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② 《六世达赖秘传》木刻版，10页上、11页上下、15页上—16页上、16页上—17页上下、21—69页、84页及88—89页。

司桑结嘉措是在五世达赖死后立即认定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的，这从第司桑结嘉措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给康熙的密奏中可看出：“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喇嘛于壬戌年（1682年，阳水狗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①仓央嘉措在十五岁前，一直处于桑结嘉措的严密控制之下，这同对五世达赖之死“秘不发丧”一样，都是秘密进行的。《秘传》说仓央嘉措“生后一年，被秘置于本地”。《噶伦传》亦载：“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一事，第司桑结嘉措长期隐匿”。^②桑结嘉措何以如此？史书记载不一，有的说“其时第司桑结嘉措因新修布达拉宫和建造大灵骨塔，故无空暇”^③。但较多的史料表明桑结嘉措是出于政治原因。第司桑结嘉措是在五世达赖死前三年，亦即1679年出任第司的。^④在五世达赖的信任和委任下，桑结嘉措对于政务“事多专决”^⑤。五世达赖死后的1694年（康熙卅三年），康熙还诏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王^⑥。显然，桑结嘉措是握有实权的人，加之有皇帝诏封的和达赖生前委任的等头衔，遂其言行举足轻重。然而继承和硕特汗位的拉藏汗又对西藏起着监护作用，因此桑结嘉措与拉藏汗间在政治上发生矛盾。虽然这种政治上的相互牵制而引起的矛盾早在达延汗、达赖汗时业已存在，但在五世达赖圆寂之前后日趋尖锐。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之争，非同一般。又因当时拉萨当局与拉达克部落有战事，等等。这些可能是桑结嘉措所考虑采取“秘不发丧”的原因。

桑结嘉措在政治上和才华上颇为不凡，康熙对此知之，但从桑结嘉措在西藏政局中的处理过程，也觉察到“第巴桑结实倾险”^⑦。这里的所谓“实倾险”，亦即康熙后来所指的“第巴欲专国事”^⑧。因此，桑结嘉措所采“秘不发丧”，是企图稳定五世达赖死后的政局，大体如他在给康熙密奏中所说：“前恐唐古特（即西藏）民人生变，故未发丧”^⑨。显然，这里隐去了桑结嘉

① 《圣武记》第五卷，8页上、5页下、7页上、6页上、8页上下、9页下。

② 《噶伦传》木刻版，45页下。

③ 《六世达赖秘传》木刻版，10页上、11页上下、15页上—16页上、16页上—17页上下、21—69页、84页及88—89页。

④ 《嘉木样协贝金吉年表》木刻版，25页下。

⑤ 《圣武记》第五卷，8页上、5页下、7页上、6页上、8页上下、9页下。

⑥ 同上。

⑦ 《圣武记》第五卷，8页上、5页下、7页上、6页上、8页上下、9页下。

⑧ 同上。

⑨ 《圣武记》第五卷，8页上、5页下、7页上、6页上、8页上下、9页下。

措“欲专国事”的意图。既然不敢公开五世达赖死讯，也就不能公开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但桑结嘉措又暗中选定仓央嘉措，其目的无非是将仓央嘉措作为他的政治筹码，继续掌权。这种做法，在康熙觉察后，桑结嘉措密奏原委，并“求大皇帝勿宣泄”，康熙经考虑，“上许为秘之”^①。由此看来，康熙是权衡了五世达赖圆寂后西藏的复杂政局而“许为秘之”的。

仓央嘉措一开始就在上述政治斗争背景中被人推上了复杂的政治舞台，当然，他自己并未觉察。仓央嘉措作为转世灵童的公开，是在康熙征噶尔丹的1696年（康熙卅五年），与公开五世达赖死讯同时。桑结嘉措公开上述两事是被迫的，是在康熙觉察并经指责下公开的。首先，桑结嘉措的使者在密奏康熙后，自京返藏途中向策妄阿拉布坦首先“宣言达赖已厌世”，继之康熙“以第巴始终反复持两端，乃追还其使，传集各蒙古宣示密封”^②。在这种情况下，桑结嘉措政治上尽处于困境之中。仓央嘉措就在这种政治风浪中被公诸于世，其处境可想而知。

仓央嘉措在1697年（康熙卅六年，火牛年）9月17日在浪卡子随五世班禅洛桑益西出家，取名为洛桑仁青仓央嘉措。同年10月25日，迎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内的司西平措殿堂坐床。^③康熙虽对桑结嘉措事先不报朝廷而立新达赖，甚为动怒，但出于大局，当时仍予以承认，并亲派章嘉呼图克图参典。史书载：“康熙皇帝亲派章嘉呼图克图等至藏，迎至布达拉坐床，御赐珍物甚多。”^④看来，这时康熙及蒙古汗等是承认仓央嘉措的正式转世身份的。

仓央嘉措坐床后的政治气候，表面较平静，他在桑结嘉措的严格监督下开始了学经活动。仓央嘉措的经师除班禅五世之外，还有促陈达杰、格隆嘉木样查巴及格列绎措。“桑结嘉措严令嘉木样查巴根本经师等，督促六世达赖精进奋学。”自由生活惯了的仓央嘉措，有时厌学而去散步，经师们尾随，恳求他坐下听经，唯恐桑结嘉措追究责任。^⑤仓央嘉措往往为经师及自己这种心惊不安的学经活动流下凄然之泪。但是，他仍被迫学了许多经典，诸如经咒方面的

① 《圣武记》第五卷，8页上、5页下、7页上、6页上、8页上下、9页下。

② 同上。

③ 《六世达赖秘传》木刻版，10页上、11页上下、15页上—16页上、16页上—17页上下、21—69页、84页及88—89页。

④ 《西藏喇嘛事例》清钞本第1册、第2册。

⑤ 《六世达赖秘传》木刻版，10页上、11页上下、15页上—16页上、16页上—17页上下、21—69页、84页及88—89页。

《根本咒》、《菩萨随许法》、《秘诀》、《供咒经》、《续说》、《生满诫》；经藏方面的《菩提道广略教诫》等。为了督促仓央嘉措学经，第司桑结嘉措还亲自讲授。史书载，桑结嘉措本人“博学并精通五明，医药及历算等著述颇多”。因此，这对仓央嘉措学好经典极为有利。《甘珠尔》经典要学三遍，一遍先从桑结嘉措学，又分别随嘉木样查巴及德顿日甸林巴学两次。所学内容不分派别，诸如萨迦、格鲁、宁玛等各种有成就的经藏、密咒、教规等等无所不学。仓央嘉措还随以热强巴查巴群佩为主的格西，学习因明、诗歌和历算。此外，在冬季仓央嘉措还在雪地上学跳各种金刚舞。据载，他还是射箭能手。由此可见，仓央嘉措纵使所学非所愿，但毕竟从这些学习中获益匪浅，这对仓央嘉措情歌的写成在知识上、技巧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除去上述学经之外，仓央嘉措还参加宗教活动。据《西藏喇嘛事例》载：“随在三大寺（高僧）登座讲经，又于前藏大招楼顶，新建金顶及佛尊甚多。”

并非自愿成为达赖喇嘛的仓央嘉措，十五岁以前的生活给他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怀念家乡的一切。虽然高墙深院、戒律森严的宫廷生活、宗教学习频繁，似乎都未能从根本上束缚住他的思想。看来正好相反，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①。宗教的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等等，都增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这些原因之外，又加之围绕他的政治角逐，等等。这样，生活迫使他逐渐成为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白天仓央嘉措以密法佛徒出现，夜晚则以宕桑旺波化名潜游于酒肆、民家及拉萨街头。以至后来竟在布达拉宫内“身穿绸缎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醉心歌舞游宴”^②。更有甚者，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水马年）他竟在巡游日喀则时，向其师班禅罗桑益西送回僧衣以示退戒，只保存世俗之权^③。

仓央嘉措的生活，为桑结的政敌提供了可供攻击的口实。围绕仓央嘉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首先策妄阿拉布坦奏：“第巴奸谗及所立新达赖之伪”^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斯·卡莱尔的和现在》。

② 《列隆吉仲日记》。

③ 松巴堪布：《青海史》，7页下。

④ 《圣武记》第五卷，8页上、5页下、7页上、6页上、8页上下、9页下。

同时，拉藏汗“以议立新达赖喇嘛故，与第巴交恶”^①。在这种情势下，第司桑结嘉措于1702年卸任，由其子阿旺仁青继任第巴。桑结嘉措的卸任是以拉藏汗撤出拉萨回青海为交换条件^②，可见其时在掌握西藏权力上的斗争之烈。

桑结嘉措的卸任并不意味斗争的结束或缓和，所不同者是桑结嘉措由台前退到幕后，新第巴阿旺仁青只不过是其代言人。《松巴堪布全集》载：“第司桑结嘉措与最高首领拉藏汗争辩不和”，在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第巴谋毒拉藏汗不遂”，原因是“桑结以拉藏汗终为己害”^③。据藏籍说“丹增旺杰（桑结买通的拉藏汗的内侍）以毒杀之”^④。对桑结嘉措与拉藏汗间的矛盾，康熙最初是采取调和态度，藏籍载：“拉藏汗曾向皇帝奏书，书内对仓央嘉措是真达赖化身表示怀疑。皇帝乃遣精明之善察使者前来。使者至，即请仓央嘉措裸体坐于座上，细观其前后左右，以察征兆。随后使者谓：‘此喇嘛不知是否是五世达赖化身，但确有圆满圣体之法相’，言罢礼拜而回，返归内地。此后，动乱日烈，皇帝洞悉，特派恰纳喇嘛及阿南卡二人，对第司和拉藏汗二人进行调停。但当二使者行将抵达之际，第司已被拉藏汗所杀”^⑤。在西藏内部，亦多主张桑结与拉藏汗和解，1703年新年和1705年初的双方两次军事冲突，都是经三大寺代表和嘉木样协巴的调停而暂缓下来。但是，权力问题是难以调和的。正如上节所说，1705年初双方议定，拉藏汗退往青海，桑结嘉措退至山南。而拉藏汗佯退青海，实集结兵力于黑河。当年六月拉藏汗以三路大军直取拉萨，桑结嘉措逃往贡噶宗，被杀于久垒^⑥。

对于桑结嘉措，康熙虽斥责他“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袒庇噶尔丹”等等，但并不打算除掉他。所以，前述康熙特使恰纳喇嘛闻桑结被杀，立即追问。据藏史记载：“两位金字使者抵藏，对于如何杀死桑结一事，拉藏汗闪烁其词，不知所措。”^⑦但对于在噶尔丹事件上站在清廷一边的拉藏汗，康熙亦

① 《圣武记》第五卷,8页上,5页下,7页上,6页上,8页上下,9页下。

② 《松巴堪布全集》。

③ 《清史稿》卷五二五,刘传三百十二,第8页,藩部——西藏。

④ 松巴堪布:《青海史》。

⑤ 《六世达赖秘传》木刻版,10页上、11页上下,15页下—16页上、16页上—17页上下、21—69页、84页及88—89页。

⑥ 《松巴堪布全集》。

⑦ 《六世达赖秘传》木刻版,10页上、11页上下,15页下—16页上、16页上—17页上下、21—69页、84页及88—89页。